贺村发现5000多年前人类的居住地

◎钱 华

1978至1979年，江山开展了一次声势浩大的黄土丘陵大开发。于是，著名考古专家、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牟永抗老先生来到江山，在峡口肩头弄、山崖尾、地山岗、淤头岗等地进行全面考古发掘。1981年，他将发掘成果《江山县南区古遗址、墓葬调查试掘》报告发表在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上。报告确立了江山不仅有支土著人的存在，还阐述了江山在4000多年以前人类的活动轨迹，并与二里头文化有承前启后的文明史，他把江山史前文明命名为“江山肩头弄类型文化”，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

之后，牟永抗又来到贺村开展调研，发现温山、安山、乌头山、坝贺大山、实在岭、苏家山、虎头山、淤头大山是商周时期贺村人的居住地。8处贺村人早期的居住地，面积最大的是淤前温山、坝贺大山遗址，约有4万平方米；狮峰实在岭、坞里苏家山遗址，约有1万平方米。可见温山等地在4000多年以前是块非凡之地，这里不但人口密集，而且村落也非常大。可惜，现在很多遗址已经被人为破坏得非常严重，遗址上已经建了很多民房、厂房，或被改田、做公墓。

当年由于条件有限，没有展开发掘。但在这8块神秘的地表上，牟永抗采集到石锛、石斧、石矛、石镞、石网坠、双孔石刀等石器，以及泥质陶、夹砂陶、着黑陶、印纹硬陶等陶鼎、罐、釜、罇、钵、甗、陶纺轮、盆、盂和原始瓷豆等残器。陶片纹饰有编织纹、方格纹、席纹、云雷纹、曲折纹、回字纹等。

从牟永抗传递的实物信息中了解到，贺村在4000多年以前，已经进入以农业经济为主，渔猎经济为辅的时代。

2013年4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原副所长陈元甫在调研“浙江瓷之源”江山片原始瓷窑发展过程中，重温了早期贺村人的居住地。他认为，早期贺村人除发挥自己聪慧的能量，把居住环境选定在依山傍水，而又朝阳的地段外，生活质量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

4000多年以前，贺村人靠猎取动物而生存。他们不仅能把河滩上的卵石取回住地，加工成锋利的石锛、石斧、石矛、石镞、双孔石刀等石网坠，上山狩猎下水捕鱼，而且还会种麻，利用陶纺轮织布。

除此外，贺村人已经知道用火的力量来进行烧煮食物。在坝贺大山、狮峰实在岭遗址中出现陶鼎足、甗等，陶鼎有三足，形如鬲，常见与釜组合，它是一种炊器，釜的演变也与古代青铜器有关。最初，釜是由鼎的三足演变而来，随着炉灶的出现，釜的三足逐渐退化。釜的耳和环则是从甗演变而来，甗最初耳部的形制为饕餮兽面，两侧兽面各口衔一环。这种演变反映了鼎从贵族器物向平民炊具的转变过程。釜，敛口圜底，或有二立耳，其用于鬲，置于灶，上置甑以蒸煮。釜取代了几千年以前单一用火烤食物的历史。其中还在其它遗址中发现罐、罇、钵、甗等配套容器，这些容器用途不一，罐，可用来盛水；罇，口小腹深，容器，有“酒罇”一说；甗，《释文》云，酒尊也，《周礼·春官·鬯人》云，凡祭祀社壝，用大甗，《礼·明堂位》云，山甗，夏后氏之尊；钵，是洗涤或盛放东西的器具，形状像盆而较小，用来盛饭、菜、茶水等。这些器皿的出现，标志着农耕文化已经渐渐发展成熟。

贺村，地处江山西南端，距城区约10公里。钱江源之一的须江水从这里穿流而过。贺村129平方公里的区域，山势平缓，气候宜人，环境优美，非常适宜人类生产生活。

2017年9月至2018年1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仲召兵等专家在峡口山崖尾遗址发掘，其间，又来到贺村调研，发现姜家、潭头山还有二处早期贺村人居住的遗址。经观察，姜家自然村的姜家遗址已被村庄占压，遗址紧邻须江西南岸，坐落在一处自然台地上，遗址高出周边农田约2米，近圆形，面积约1万平方米，具有相当的文化个性和独立性。

于是，2020年8月至12月，仲召兵领队对姜家遗址进行科学考古发掘。发掘面积约200平方米，共清理明代墓葬3座，宋代墓葬5座，水井1口，灰坑4座，商代灰坑11座，新石器时代晚期灰坑28座，建筑遗迹3处，沟槽3条，其中以3处建筑遗迹最为重要。出土各时期陶器、石器、青铜器等文物50余件。

姜家遗址俯视图

“姜家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存的陶器面貌特征与山崖尾早期阶段一致，年代相当，距今约5000年。这是近几年新发现的一种文化类型，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本地的土著文化遗存，为好川文化的重要源头。姜家遗址的发掘进一步丰富了前好川阶段文化遗存的内涵，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随着这一类材料的积累，可以将之命名为一种新的文化类型。”

这是研究员仲召兵在2020年省考古所年底总结报告中的一段话，这段话打破了人们常规持有的“江山肩头弄类型文化”的认知。他根据姜家遗址的灰坑、建筑遗迹、出土器物等特征，以及碳14测试，确认贺村在5000年前左右就有人类在此居住，年代约相当于良诸时期（距今5300-4300年）的早期。

2023年7月10日至9月30日，省考古所仲召兵、姚吉馨，暨南大学历史系熊增珑教授等又对贺村潭头山遗址进行科学考古发掘，发掘面积约600平方米，共清理灰坑30余个。出土石器较多，有石锛、石凿、石锤、石网坠、石斧、石锛、石刀、石饼、石球以及石料和各种石器半成品；陶器有纺轮、陶盘、陶盏、陶钵等；还有4件玉器和1件耘田石器。

4件玉器出土时已经破碎，器型无法确认。远古时期，人们把玉器用作为礼品或赏赐品，它显示的是权力和地位，同时也是财富的象征，可见，早期贺村人就有了等级区分的存在。在该遗址中还发现1件难得一见用河卵石磨制成型的耘田器，耘田器长约12厘米，宽10厘米，厚2厘米，石材极其坚硬，单面刃，中间用人工磨制成一小圆孔，直径约2厘米，可安装上木柄使用，这是江山至今发现的第一件耘田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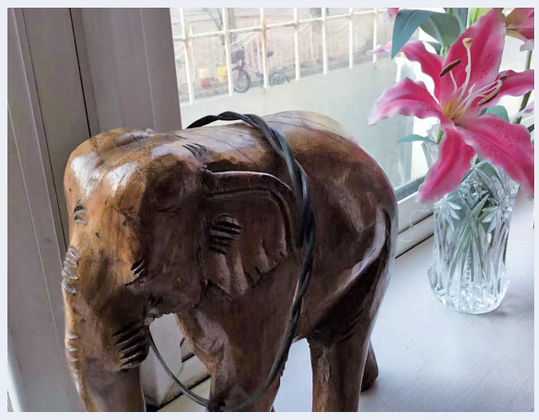
潭头山遗址发掘现场

贺村姜家、潭头山遗址有着相当的文化价值，从灰坑柱洞角度观察，早期贺村人居住条件也渐渐走向了成熟，出现了干栏式建筑的遗风，在4000多年以前他们不但有了自我保护的意识，而且，对食物存贮也有了科学的管理办法。

老清湖街的那些人和事

之匠人朱旭棠

◎程连鹏


图为清湖匠人于1938年打造的银器

匠人一词是当今叫得最火的词汇之一，什么大国工匠，工匠精神，常常见诸于报端、电视、杂志、网络，全民也都在跟着叫，要有大国工匠精神等等，似乎这样才算跟上时代的步伐。

本人青春年少风华正茂时，正值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没有正经读过几年书，凭我对工匠的理解，工匠不就是有一门手艺的匠人吗？什么裁缝匠、木匠、泥水匠、篾匠、铁匠、剃头匠、漆匠、打铜匠、箍桶匠、银匠、金匠、补鞋匠等等。且行当过去老清湖街都有，这些手艺人我大都认识。但要真正成为一个合格的匠人并不容易，不仅其手艺要精，制作的工艺品要得到人们的认可，还要有传世的意识，经得起历史的考验，这样的人才能算得上是一代匠人。

我的童年就是在匠人的铁锤声中成长起来的，不管春夏秋冬，叮叮当当的敲打声陪伴我从孩童到少年到青年，直至离开清湖步入社会。我家斜对门的打锡匠朱旭棠，大家习惯上叫他旭棠师傅，祖籍长台镇，魁梧的身材，在那个年代的清湖街也是不多见的。我从记事起，他给我的印象永远是剃一个大光头，一到夏天几乎是光着背，从不穿上衣，裤子是老式的那种，不用裤带，一卷就行，现在都没有看到过。整天挺着个大肚子，不得不让人联想起庙里的弥勒佛。他一生只专一打锡这行手艺，从学徒开始走进这一行，直至最后他和他的这一行业都逝去了。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清湖街还有两三家打锡店，后来随着改革开放，塑料制品的出现，取代了一些锡器产品，这也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随着老手艺人的故去，没有继承人了，这一行在清湖街也就消灭绝迹了。只有残留的零碎记忆留在我们这些五零、六零后的脑海中。我总觉得不写上几笔，对不起他们为之奋斗一生养家糊口的传统手艺。

传统手艺有很多门类，唯有金银锡匠有别于其他门类，都属金相科目，只有通过高温熔化锻打和其他工艺的配合，才能出产品。但锡是如何从固体熔化成液体再固化成固体的工艺过程，我是从小到大亲眼目睹旭棠师傅操作的。原材料除了老旧回炉的锡器外，很大来源是千家万户的废牙膏壳。那时还没有塑料制品，牙膏全是用锡制作的牙膏壳，空牙膏壳一个值三分钱，对“卸倪鬼”来说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因此，造成很多“卸倪鬼”趁大人不注意偷偷地挤出牙膏去卖空壳，时间一长大人总奇怪这牙膏怎么这么不经用，殊不知其实是“卸倪鬼”为了换钱的杰作。一支牙膏壳，三分钱可买一个又香又好吃的焦盐烧饼呀，这在那物质非常匮乏的年代，对“卸倪鬼”是多么大的诱惑。

我们家和旭棠师傅的打锡店是五十多年的老邻居，从战乱年代到改革开放，共同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那时的邻里可是肝胆相照，有难同当，现在是不可想象的。我们家兄弟多、负担重，加之又是外地人，要钱没钱，要权没权，只有靠邻里帮忙才能渡过难关。听我妈和我大哥说过，解放前抓壮丁，旭棠师傅主动叫我爸躲在他家楼上，才避过了镇公所兵丁的搜捕。他以良善的人性担当救了我们一家人，再次证明了远亲不如近邻的至理名言。

在那个年代，清湖街屋连着屋，店挨着店，一家烧什么好吃的，左邻右舍都能闻到。特别是旭棠师傅的特色菜大蒜炒猪肉，真是一绝。只要他在那个干活的小火炉上烧这道菜，一阵阵的大蒜夹着猪肉的香味，顿时弥漫在整条街的上空。那时的大蒜可不是大棚蔬菜，是露天种的，施的是农家肥，无化肥无催化剂，更不存在转基因品种，纯环保的产品，香气特别，能享受到这口福的可不是一般的人家呀。好多赶墟的农民闻到这香气也连连咽口水，挪不开脚步，都说这猪肉炒大蒜怎么这么香，在自己家怎么炒也炒不出这种香头，到底是师傅的手艺不一般啊。

我们小时候吃饭可以顺街走着吃，一碗饭从上节街吃到下节街，东家一口菜，西家一口汤，吃完了空碗在手里还可以玩上一阵子，飞旋、抛高，像杂技一样，常引来小伙伴和路人的叫好。可惜好马也有失蹄的时候，如果没接住，碗摔了个稀巴烂，这下可就闯祸了。打破一只碗可是“大罪”呀，少不了挨我妈一顿打。补救的办法，就是索性连筷子也丢掉，玩半天再回家。我妈做裁缝很忙，早把端饭碗出去的事忘了，只是叫你去洗碗。这样总算躲过了一场皮肉之痛。

据我观察，旭棠师傅小日子过得相当充实，除了靠打锡干活赚钱，还有两个业余爱好。一是钓鱼，他钓鱼特定在清湖大溪滩钓，用自制的煤油灯盏，四面贴上玻璃罩，顶上留有出气孔，他还专门向我讲解火与气流的作用，效果确实不错，有几次才一会儿，等我们几个“卸倪鬼”在下节街玩了一会，想去看看他的战果如何，不想他早就打道回府了。等我们回来看他，他已在吃鱼了。一盅热的黄酒，自斟自喝，独自一人在品味大自然恩赐的河鲜美味，相当享受。原来他有即钓即食的习惯，不管多晚，只要钓到一条鱼即刻收竿回家煮食，从不过夜。我们不解，问他去趟河滩为何不多钓几条回来？他却说你们“卸倪鬼”不懂，清湖大溪的鱼是钓不光的，留着下一次再钓，但钓回来的鱼要活鲜，养到明天那品味就变了。这是我今生遇到的钓鱼第一奇人。

二是下象棋，一年四季几乎每天晚上到午夜你都能听到“照”声夹着棋子的拍拍声响彻在清湖古镇上节街的半空，我们知道旭棠师傅又在棋盘上杀得昏天黑地了。象棋的将军他叫“照”，听到“照”声就知道对方的将或帅被他将得不得不东躲西避，这时的下棋声更是震天响。因为他是鳏夫，属于一人吃饱便全家不饿的那种人，也没有人管他，尽管邻居有时也难免有微词，但那时的人纯洁得很，从没人当面说过什么。他也是一个性情中人，我曾偷偷问过我堂二哥程遥鹏，因为他的棋艺在清湖街属一流的水平，他可以狂到把将军用钉子钉死在棋盘上，若对手围住了他的将他就自认输棋。我问他好像从没见旭棠师傅和您下过棋，他说你别听他整天叫得震天响，其实是个臭棋佬，我就是让他几个棋子他还得输，和我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后来我也问过旭棠师傅我二哥的棋艺如何，他说人家军校的军官，又是右派分子，很有知识，脑子聪明得很，我一个大字不识几个的怎能和他比呀！

我从小就喜欢自行车，大哥也知道我喜欢自行车，他常打趣地说没有自行车我都不肯出世。15岁那年，我在清湖邮局替班送过信，就朝思暮想有一天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自行车。那时有辆自行车比现在的一辆宝马小汽车还牛。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从部队退伍，大哥给了我一张自行车票，我东拼西借加上几十元的退伍费凑足120元，买了一辆“永久”牌自行车。没想到我第一次骑回清湖街就被旭棠师傅看到了，他马上放下手上的活，摘掉老花镜，饶有兴趣地仔细打量起来，嘴里连连称赞上海人的手艺确实做得好，并说他年轻时也会骑自行车，可惜一辈子没买过一辆车，那时根本想都没想过这辈子买车的事，哪怕二手车也没能力买。他小声地问我能否让他骑一下，末了还补上句说就在门口大街上骑。我说当然可以，但一定要小心一点。当时的清湖街是用鹅卵石铺的路，滑得很，只有中间一条窄窄的青石板路，可惜上世纪八十年代为了适应车子行驶，把全清湖的鹅卵石路全挖掉了浇了水泥路。

只见旭棠师傅骑上车快速在上节街骑了一个来回，稳稳地下了车。我正为他这么大年纪还能这样快速地骑车而诧异，他却和我解释说到底年纪大了，加上多年不骑，技术差了。并告诉我骑自行车是越慢越有本事，我这才知道这个道理。

从我懂事起就见旭棠师傅是一个人，活得很自在，后来听老辈人说他年轻时也有一个“卸倪鬼”（儿子），是雇石口人奶大的，所以叫“石口倪”。可惜少年就夭折了。小时候听我姐说他们几个“清湖卸倪”和“清湖娜妮”，经常结伴去小清湖坂剪马兰头野菜，“石口倪”人长得高，又很和顺脾气好，他总去一些有一定难度的田塍边剪马兰头，而把方便的地方留给“娜妮鬼”剪。我们家剪回来的马兰头炒炒就吃了，而每次旭棠师傅都要用鸡蛋炒来吃，犒劳“石口倪”的辛劳。我姐也试图向我妈提议这种炒法，肯定很好吃，却被我妈迎头痛骂一顿，说这是败家子的浪费做法，这么金贵的鸡蛋怎么能和野菜一起炒？

有一次“石口倪”和我姐一大帮“清湖娜妮鬼”又结伴去小清湖坂剪马兰头，这是一个星期天。那天太阳高照，天气格外好，突然“石口倪”说肚子很痛，当时她们几个小孩子都不知何故，等大人把他抬回家就死了。那时医疗水平也差，普通老百姓总觉得肚子痛也就是蛔虫在作怪，喝点菜籽油拉一下肚子就好了。如果是中暑，喝点草药水也就没事了，没想到“石口倪”会死。这件事是旭棠师傅一生的痛，所以从未听他提起过。

时代在进步，新工艺层出不穷，新产品推陈出新，许多手工艺都在清湖街消失了，老工匠老手艺也一去不复返了。我作为一个出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清湖街的“卸倪鬼”，却常常怀念清湖街的那些老手艺，特别是那些匠人，那才是具有人间烟火味的清湖街。